

# 中学 西话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THUS SPEAKS THE  
WEST ON CHINA:

CHINESE QUESTION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曾 军 主 编

非外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中学 西话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THUS SPEAKS THE  
WEST ON CHINA:

CHINESE QUESTION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曾 军 主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学西话: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 曾军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  
ISBN 978-7-301-31095-3

I. ①中… II. ①曾… III. ①文艺理论-西方国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06652 号

- |       |   |
|-------|---|
| 书 名   | 中学西话: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br>ZHONGXUE XIHUA: 20 SHIJI XIFANG WENLUN ZHONG DE ZHONGGUO     |
| 著作责任者 | 曾 军 主 编   |
| 责任编辑  | 刘 爽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1095-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nkliushuang@hotmail.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9634                                  |
| 印 刷 者 |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br>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15.25 印张 340 千字<br>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5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序

呈现给各位读者的,是由本人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的阶段性成果。自2016年年底立项以来,课题组所有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完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截至2019年11月,课题组成员先后在SSCI或AHCI刊物 *Babe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LCWeb), *Neohelicon*; 国内重要期刊《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社会科学战线》《求是学刊》《南京社会科学》《学习与探索》《探索与争鸣》《学术界》《人文杂志》《文化研究》等上发表论文七十余篇,还有一批成果也在陆续出版。这些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多篇;多项成果也获得诸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学术类奖项;在许多学术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成果也成为大家推送和转发的热门文章。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成果依不同的主题遴选出一批代表性文章,并汇编成册,以求教于方家。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这个问题,主要建立在两组二元概念(一个是“中国/西方”,一个是“文论/问题”)基础之上,预设了“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理解与阐释”“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冲击与影响”以及“中国文论如何更好地阐释中国问题”“中国文论如何回应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等诸多问题,并最终指向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这一确立中国文论主体性的问题。但这两组二元概念本身包含着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之类的概念术语如何获得相对明确的学术上的界定?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与发生在中国的中国问题既有同源性,

又有异质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对话性关系?中国学者如何通过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自我言说和自我阐释改变“中国问题”作为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因素和沉默的他者的形态?这些前提性的问题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和辨析的。对此,本人已先后撰写了《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3期)、《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范式》(《学术研究》2016年10期)、《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5期)、《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10期)等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本书也收录了其中的一篇)。与“中国问题”相关的表述还有很多,如“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模式”等,其内涵和外延也颇多含混之处。对“中国问题”的“中国性”方面已在拙文《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相关问题》中做了辨析。对“问题”的不同尺度的把握将影响到研究范围和领域的确定。这里的“问题”究竟是由中国提出的“(既可能与中国有关,也可能与中国无关的)问题(question)”?还是在中国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麻烦)问题(problem)”?抑或是比较中性的与中国有关的“(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议题(issue)”?或者再宽泛一些,只要包含中国的“因素(factor)”都可算在内?本文无意在此过于咬文嚼字,而是采取相对折中的办法,选择包容性更强的作为“议题(issue)”的问题为核心概念,一方面涵盖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学术性问题,既包括那些“(亟待解决的麻烦)问题(problem)”,也包括与之相反的可值得赞赏和总结的成功经验(experience);另一方面又能相对聚焦和集中,既将那些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可能与中国关系不大的问题(question)排除在外,也不用把注意力过于分散到零散的还未凝聚和提炼为“议题”的那些“因素”(factor)上。在此序言中,本人着重谈以下三个问题。

## 一、“中国问题”的两种形态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这一表述也预设了“中国问题”以两种基本形态作为西方文论观照和研究的对象:一种是“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另一种则是“以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

“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或者简言之“中国文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具有与“西方文论”“西方理论”和“西方思想”相同或相似知识形态特征,因而是可以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对话和辩论的理论“他者”。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

一方面,碰到的问题却是“理论化形态的中国问题”遭遇的知识合法性上的质疑。2001年,德里达在与王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提出“中国没有哲学”的看法,从而哲学界一直有过的中国“有思想,无哲学”“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被火上浇油。论者还翻出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质疑的旧话,或通过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通性来论证“中国有哲学”,或通过哲学形态多样性来强调“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也有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者承认“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等。相似问题同样在文论领域中存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逻辑前提即是中西文论之间无论是在概念范畴,还是在思想体系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文论迫切需要能够按照西方现代文论的方式进行学术思想的转换,以获得新的理解和阐发。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都获得了西方文论的同等对待。中国的学术思想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到经史子集,文献典籍可谓浩如烟海,但是真正获得西方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并不多,无外乎孔孟老庄、周易禅宗,这就使得西方文论对理论化的中国问题的认知存在明显的“窄化”特点,相应地也导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形成某些简单化的关于“文化中国”的刻板印象。同样的,现代中国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转换,但真正对西方造成深远影响的却只有“毛主义”,并由此形成各种思想偏见。

“以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经验”“中国现实”“中国实践”等。它们或者没有被理论化或没有被完全理论化,因而无法自我命名或自我言说;或者虽然已经形成了理论化的知识形态,但西方学者在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已有的理论化的知识与其所认识的经验事实相匹配,因而出现“中国经验”与“中国理论”被有意无意剥离的现象。当西方文论以这些经验形态呈现的中国问题作为对象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时候,同时也就在或多或少地进行着理论化(即“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的过程。于是,便会出现两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一种是尚未被理论化或未完成被理论化的中国经验被西方理论阐释,并获得了命名。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是建立在对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全面系统的梳理基础之上,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继“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

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之后,衍生出“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了?”“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等问题,与之类似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还有诸如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以及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也成为西方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理论。中国学者如何应对这些经由西方理论所提出的对于经验形态的中国问题的理论化阐释,是否有可能提出对相关理论的修正、完善、改写,甚至是颠覆性的全新阐释框架?这就成为中国学者在应对由西方理论命名中国问题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另一种则是中国虽然形成了比较成熟并自洽的“中国理论”,但西方学者在对相应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现实的阐释中,并没有采用中国的理论范式,而是从西方学者自己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出发,形成了有别于中国理论的新的理解。比如说,中国的汉字源远流长,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字学理论也是体大思精,不仅形成以“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为分支的“小学”体系,而且在漫长的汉字演化中还形成“远古”“上古”“中古”“近古”的不同时期的分野。在法国后结构主义运动中,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等众多学者对中国的汉字产生了浓厚兴趣,但是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并不是在中国的文字学理论框架内展开系统性的认知。他们更多的是在印欧语系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中通过差异性的比较来形成对汉字的基本认识。虽然这些学者也试图学习汉语,但大多都浅尝辄止。他们或者借助法国汉学家的翻译介绍(如戴密微和程抱一就曾帮助拉康研读过中国的古代经典),或者在汉字解读方面望文生义(如拉康在其研讨班中曾多次解读过中国的汉字,索莱尔斯也曾在其小说《数》中将对汉字的图解作为小说的结构因素),即便是克里斯蒂娃曾经专门研究过汉字,但所凭借的资料也大多来自汉学家介绍的二手文献(如她于1969年出版的《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再比如对中国诗词、书画、戏曲等中国传统艺术的接受,无论是庞德的受中国诗歌的启发发展出来的“意象主义”,还是本雅明对中国书法的“笔迹学”解读,抑或布莱希特用“姿态美学”来理解梅兰芳的表演,西方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以知识论的方式来客观认识中国文化,而是以认识论的方式将中国文化进行理论化阐释。

## 二、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两种关系

从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两者的关系角度，“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另一种是“外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所谓“内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是指西方文论家在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不是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是将中国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放在全球和世界的整体之中来考查。换言之，是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中的部分来看待的（当然西方学者在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中存在着诸如将“美国化等同于全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中国哲学的处理是放在“导言”之后和“第一”之前的奇特位置。黑格尔还特别声明：“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我们只是附带先提到它一下……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被视为“东方哲学”的包括“中国哲学”（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和“印度哲学”。再比如布洛赫的皇皇巨著《希望的原理》以犹太教预言家的姿态将“世界过程”纳入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思想体系的最后部分（即“第五部分（认同）——满足时刻的希望意象”）中的第53章的第二部分集中探讨了他所理解的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孔子的“天地平衡”之道和老子的“隐性的世界韵律”之道之间，布洛赫表达了更倾向于孔子之道的想法，体现出布洛赫基于弥赛亚主义世俗化的一种“道”的选择。众所周知的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也是通过引入“汉字”这一有别于表音文字的文字系统来实现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

所谓“外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是指，运用已经形成的基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的理论范式来分析和理解中国问题。在这一阐释过程中，中国问题不是作为西方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的思想资源和佐证材料，而只是作为西方理论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印证。我们经常说的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削足适履，即是指这种情况。如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时其实对小说中虚构的中国皇帝修万里长城并无多少了解，因此本雅明的策略就是将对卡夫卡《城堡》等作品所形成的关于K的印象想象成罗森茨维格在《赎救之星》中所描绘的“无面目的中国人”形象；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出于在中国教学的需要，以《聊斋志

异》中的“鸽鸽”为例演示了格雷马斯语义方阵的批评实践,采取的是割裂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文化传统的纯粹的文本分析策略。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各种后殖民主义理论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之后,中国导演张艺谋的作品也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特别青睐的分析对象。这些对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和解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西方文论检验理论方法有效性的对象;西方文论也并不将之作为解决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手段。

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有一个“由内而外”的“外在化”或“由外而内”的“内在化”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如“毛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首先是以一种内在性需要出发的主动接纳,但随着“五月风暴”的退潮,“毛主义”也逐渐淡出一部分法国学者的视野,体现为一种刻意的疏离。1974年《原样》杂志的中国行之后,罗兰·巴特得出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只带回(除政治的答复外):空无(rien)”的结论。华裔作家赛珍珠最初是作为后殖民主义问题之一引起讨论的。但随着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学界的密切交流,生长出“华文语际文学”这个试图将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学囊括在内的新领域,进而对中国的“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一个由内而外的“外在化”的发展。而弗朗索瓦·于连(朱利安)虽然一直以中国哲学、美学和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从不以“汉学家”自居,而是更强调自己“(西方)哲学家”的身份,强调自己关注中国并不是要解决中国问题,而是采取“迂回与进入”的策略,是“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的“远西对话”。这也是一个典型的“由外而内”的内在化过程。

### 三、“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三类研究主体

再进一步来说,不同的学术主体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也会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相关的研究主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西方文论家。他们的学术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西方自身问题出发或者是以他们所研究的普遍性的世界问题着眼。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中国问题只是在他们觉得需要的时候,才被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对于西方文论家而言,中国问题是以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因素、以文化“他者”的形象存在的。

一方面,“异”作为文学经验的异质性因素,本身就构成了西方文论经验的组成

部分。笔者在界定“中国经验”时曾特别强调“中国经验的混杂性”，即在全球化时代没有纯而又纯的中国性的经验，其中也包含着来自中国之外的异质性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这一逻辑同样也适用于“西方经验”。随着中国自身的全球化进程和影响力的提升，西方学术也越来越多地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且将中国纳入到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框架内展开讨论。这也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因此，从“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探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之于西方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意义问题。首先，我们可以探讨，作为“异”的中国问题，是如何使西方文论家发现并确立“自我”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镜像的？西方文论家确立了哪些具有异质性的中国问题，又是如何确立“英语文论”“法语文论”“德语文论”及“俄语文论”的哪些自我特性的？比如说，为什么英美新批评所选择的核心概念（如 ambiguity, tension, irony 等）都具有破除西方思维过分追求单一性和澄明性的特点？诸如“朦胧七型”“精致的瓮”“肌理”“张力”“反讽”这类术语多少也与瑞恰兹、燕卜苏等人多年任教于中国高校，受到侧重于悟性的、形象的、直觉的、想象的、感性的“中国思维”的影响有些关系。之所以会形成古代中国社会形态和治理结构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主义”的认知，也是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西方”或“西方式民主”这一自我认同密切相关的。而以“毛主义”为代表的“革命中国”为什么在法国左翼理论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和知识生产能力？这不能简单归结于从萨特、阿尔都塞到朗西埃、巴迪欧等人的误读和想象，而在于“作为法国左翼理论中的革命中国”是植根并同构于以“五月风暴”为标志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对此问题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将他们所理解的“毛主义”等同于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思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法国语境中，“原样派”能够一度左翼化，而一旦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便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正是“想象的中国问题”与“真实的中国问题”之间发生了冲突和矛盾。

另一方面，“异”也成为西方文论在追求普适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西方文论毫无疑问是植根于西方的本土文化土壤之中的，但在全球化、现代化和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作为他者的异质性文化也成为其关注的对象，甚至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什么 20 世纪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会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思想、中国革命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象感兴趣？原因非常复杂，这里既有西

方文论为了寻求自身理论的普适性而做的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的努力和尝试,也有为了解决和克服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而取道中国,寻求“他山之石”的意图,还有经过与中国艺术的接触而受到深深的感染,从而获得了艺术创作和理论创新的灵感等。我们经常说,西方文论是基于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而发展起来的,重理性、逻辑,轻感性、体悟。但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有不少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西方文论家在理论思维上有着鲜明的注重感性、诗性和伦理的特征;20世纪后半半个世纪的以阶级、种族、性别为对象的诸多文化理论思潮也是在全球化、跨文化交流,乃至文明的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后殖民主义。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本来首先是作为在西方世界被边缘化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出于文化认同和学术批判的需要而推动的,认为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因而具有鲜明的“反西方”的文化立场。但这一立场迅速被西方文论所接纳,将之汇入具有鲜明的“自反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学术思潮之中,形成以“阶级”“种族”“性别”等为核心领域的文化理论思潮。这种学术思路甚至影响到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学者往往会将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理论也作为后殖民主义思潮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但詹明信与其他“正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很不一样:他不是出生在亚非拉、成长在第一世界的少数族裔学者,因此他就不太可能具有其他后殖民主义学者在文化认同、文化批判以及政治立场等各方面的“独特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理论虽然具有极大的理论概括力,但有可能正好是后殖民主义要批判的“对东方的想象”。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推动下,作为“异”的中国问题,也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论家的关注,成为西方文论“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第二类是海外汉学家。他们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既是西方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魏特夫和德里克。但更多的则只是对“汉学”或“中国研究”感兴趣的专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参与了西方主流理论的建构(如卫礼贤、戴密微、程抱一和弗朗索瓦·于连),另一部分人则更多是与中国本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如王德威、顾彬和浦安迪)。前者是直接为西方文论的知识生产提供学术服务,通过中国典籍的翻译和阐释,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为西方文论所

需要的中国问题提供相关的研究材料的支撑。后者主要是借鉴和套用西方理论理解和阐释中国对象,为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新视野和方法论。由此,海外汉学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身处西方学术语境,需要获得西方主流学术的认可,因此自觉按照西方学术需要(或者逆向提出对西方学术的批评,以期补充或者颠覆既有学术范式);另一种则是积极面对中国,与中国本土学术形成互动。所有这一切,都受到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国门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进改革开放政策这“一被动、一主动”的对外开放的影响。一方面推动大批中国学者出国留学访学,另一方面则积极引进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回到/进入”中国,形成积极的对话交流机制。深受西学影响的“海外汉学”或“中国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上都给予中国本土学者以极大的新鲜感和吸引力,也刺激了更多的海外汉学学者将学术交流对话的方式从设法获得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可到积极寻求中国本土学界的青睐上来。

第三类就是中国学者自身。“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不能简单等同于“发生在中国的中国问题”。“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真实的中国问题”,另一种是“想象的中国问题”。所谓“真实的中国问题”即未加变形的、直接呈现的中国问题;所谓“想象的中国问题”,即是西方文论家间接接触和思考的中国问题。从这两者来看,“想象的中国问题”构成了已有的“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主体部分。作为中国学者来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一方面,我们要会区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中哪些是“真实的中国问题”,哪些是“想象的中国问题”,辨析“真实的中国问题”是如何被西方文论家进行“理论想象”和“西方化”的。这就必然会牵涉到“东学西渐”问题,也会涉及“异国情调”问题。前者是客观的描述,即“中学”是经过何种渠道,以何种面目,传播和影响到西方的,西方思想(文论)是如何选择性地接受“中学”中的某一方面,并予以理解和阐释的。后者则是一个中国被发现的过程,即西方学者出于何种目的、何种需要,或者要解决哪些自身的问题,又由于何种契机,接触到了汉学译介、器物的中国、想象的中国等,并赋予了“中国问题”以何种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会更多采取比较文学的影响接受研究中的“理论的旅行”“选择性接受”“误读变形”等,通过去伪存真,实现对“真实的中国问题”的还原。因为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拥有对识别判断“真实的中国问题”的学术自信。另一方面,“想象的中国问题”也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

通过对“真实的中国问题”的还原,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展开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获得来自西方学术思想的启迪;通过对“想象的中国问题”的分析,中国学者也能够更好地获得对西方文论学术思维、理论倾向以及价值立场的深切把握。这就涉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对待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误读问题。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而言,“一切阅读皆误读”。通过强化误读的合理性,可以为西方了解其他文化进行辩护,但是中国学者也不能将所有的工作仅仅局限在对误读的识别上,并认为误读就是错读,这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认识到:第一,误读有其必然性;第二,误读有其歪曲性;第三,误读也有其创造性;第四,误读也有善意和恶意之分;第五,也可以通过不断的交流理解,从而获得正确的阅读,形成共同的理解。但随着“东学西渐”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者将会不断增加其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的比重。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研究从最初由西方学者自发形成的在西方学术相对边缘和次要的研究议题到由中国学者主动参与建构的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学术领域,体现了作为“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在文论知识的建构中的独特价值。无论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还是“中国文论中的西方”,其实都是“世界文论中的中国和西方”。“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地理区域概念,任何“中”“西”都只是“世界”中的特定区域,是“全球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因此,“世界中的中西”同时包含着“世界中的中国”“世界中的西方”和“世界中的中西关系”等多重含义。所谓“中西”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西方影响中国”(西学东渐)和“中国影响西方”(东学西传)那么简单。在“中西”之间,还存在众多“非中”“非西”等其他区域作为中介因素存在。它们彼此之间的影响绝对不是“单一维度的”,也不是“两点之间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网络的相互影响。这也是本人提出“影响的多元网络”命题的重要原因。

本书依成果主题相关性,编成五篇:

第一篇集中讨论“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曾军的文章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焦虑”这一问题入手,进而展开对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认为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基于对“视域错位”现象以

及“不对等对话关系”的认识,通过“让被看者发声”(“作为被看者的‘开口说话’”)的方式,以“中国问题”为中西方文论共同讨论的平台,建立中西文论的对话机制。乔国强通过辨析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指出这个命名本身具有双重含义,提出一种“折中”或“兼顾”的研究方案。作者还提出了研究过程中的“平视”心态、跨学科视野和分类研究的策略等。围绕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种超越平行比较、影响研究、形象学以及比较诗学的新研究范式正在形成。由此可见,“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研究正在敞开全新的思想空间。面对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出现了“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的问题。苗田指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主体性建基并不仅仅在于用“中国话语”言说“中国问题”的自我循环,而在于中国文论学者的个体生命感知、社会实践积累与文化传统浸润,因此,中西文论对话的主体性建基,还是要落脚到当代中国学人的主体意识之上。吴攸认为弗朗索瓦·于连对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为中国带来诸多启发:应将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语境化的世界文明谱系中去审视,既扎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要义,又贯通人类共同成果的精髓,透过西方汉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异质性”体察与思考去发掘中国的“未思”,从而推动中国文论话语在新时代的重新定位。

第二篇聚焦“《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曾军认为毛泽东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左翼思潮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西方左翼学者在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同时对其也存在诸多误读和浪漫想象。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等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误读,形成了可以被命名为“毛泽东美学”的知识图景。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有助于恢复西方“毛泽东美学”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遮蔽的地方,从而突显被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马欣认为布莱希特对《矛盾论》的提炼和运用,是在熟读列宁辩证法并为之所用的基础上的崭新尝试,他在戏剧理论与实践分别运用了列宁著作中未曾阐明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思想,从剧情分析到表现方式,他都提出了具体的美学要求。吴娱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为线索,探究被西方话语建构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怎样的面向: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是指向实践的,这完全可以从《矛盾论》的问题意识、版本对照和文本佐证三个角度看出。而德里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倾向理论维度,如此,德里克从《矛盾论》中生发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历史目的论、反霸权等理论意义。可以看出,德里克在全球化、现代性视野下对《矛盾论》的重新解读取消了其政治实践诉求,转而变成一种后殖民的文化抵抗策略。蓝江研究了巴迪欧对《矛盾论》的看法,认为正是毛泽东的矛盾理论,让巴迪欧可以在今天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的不平衡性,从而彻底摧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唯心主义残余,而矛盾的不平衡性意味着现实是一种由多种矛盾制约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无解的,为了超越这个矛盾过程,在巴迪欧看来,就必须抛弃合二而一的思维,将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作为思考现实社会和革命斗争的唯一理论武器,在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指引下,主体从众多矛盾中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从而为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未来社会开辟了一条道路。

第三篇关注“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曾军认为,德里达在他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所撰写的著作大量涉及对中国汉字问题的思考。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字等级论”的批判是德里达必须开展自己并不懂的汉字研究的动因。德里达的策略是,通过西方汉学来思考作为哲学问题的汉字。通过解构“汉语偏见”,强调汉字属性的多重性,将“表意性”“表音性”置换为“表意价值”和“表音价值”,进而完成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此外,德里达还思考了“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问题,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姜宇辉认为德里达《论文字学》的“替补”概念并非进入汉字之思合适的概念工具,但其启示的“剧场”概念,在随后《书写与差异》《播撒》等书中进一步发挥为“书写剧场”,它所揭示的可见/不可见的折叠空间、数与形的时空游戏等特征,为重新理解汉字起源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以“书写剧场”为方法论意识,与汪迈德的汉字研究互相启示,可见汉字在发端处作为数字—计算系统,又兼理性思辨法则,即相关性逻辑,因而是一个开放而普遍的计算—思辨系统,此系统异于后世成熟的语言文字,相近于德里达的“书写剧场”。张颖发现,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汉字的兴趣,源于她受到“革命中国”的感召产生的对“文化中国”的好奇。她对汉字的思考,并非出于“研其所是”的学术态度,而是一种“经由中国”的文化态度。后结构主义语境下具有先锋意味的“互

文性”理论中的汉字因素主要表现在:克里斯蒂娃对汉字的自主性与构字的自由组合特征的思考,与“互文性”理论的推演相呼应;她用“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的相互关系映射了索莱尔斯小说《数》文本实践中对汉字书写和数字的利用。周海天认为,语言的“主体性”是本维尼斯特构建“诠释系统”和“被诠释系统”二元等级论的哲学背景,而这一思想形态是以笛卡尔之“我思故我在”论断为源头的——本维尼斯特只是把“人类理性”的“主体性”转移到“语言”上。然而,无论是《周易》中的“言象意”传统,还是古希腊诗人或《圣经》意义传释方式都呈现出一个以意义先行,并把语言“工具化”的“颠倒的等级”。无论是经典传释过程还是本维尼斯特的等级秩序,其共性在于都要把语言内化于意义中。但是,本维尼斯特希望通过否定语言的工具性而直接达到意义层面实际上是把这一过程简单化了。因为在意义传递过程中,语言的中介性与意义具有差异,但又是内在于意义中的。

第四篇探讨“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马欣所说的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可视为其“机械复制”美学思想的重要补充。将他在《单向街》中关于誊写的美学阐释放在“手工复制时代”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围绕文字的复制与艺术作品的复制之间的差异,及文字的手工复制与文字的机械复制的分歧问题,勾连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评安雅·门德尔松与格奥尔格·门德尔松〈笔迹中的人〉》,分别从誊写与阅读、誊写与讲故事、誊写与印刷三个角度进行细读与分析,揭示出誊写作为“文学文化”重要保证的笔迹学内涵,以及誊写美学在数字复制时代的启示意义。韩振江透过对齐泽克“蝴蝶意象”的分析,看到了齐泽克是如何通过“蝴蝶”这一幻象架构来想象古代中国,以及西方学者如何通过镜像他者关系来理解现代中国。理清齐泽克如何想象中国,也就为当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反思视角。

第五篇分析“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张冰通过阐释俄罗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诗学、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诗学和巴赫金超语言学的语言学诗学等理论思想,与俄罗斯汉学的中国民俗、年画、俗文学等中国民间文化研究诸问题,探讨俄罗斯汉学的民间文化研究中,以“语言学诗学”视野展示出的中国民间文化“异质”语境中的独特图景。庄桂成认为,俄国学者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从历史、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分期和相关理论问

题,尤其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的关键词给予了特别关注。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关键词的阐释,分别采用以西释中、以中释中和中西互释的视角。她对中国古代美学问题的阐释超越了“异国情调”和“东方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共生”,这是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一种理想状态。喻宛婷发现,鲁道夫·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艺术心理学研究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形,来阐释视知觉的形式动力和“异质同构”现象,并寻找中西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互通之处。他利用中国思想,尤其是道家学说,试图弥补西方思维的不足和短板。在其反思二元对立模式,弥补感知和思维、艺术和科学之裂缝的理论实践过程中,道家学说提供了灵感和思路。阿恩海姆既通过西方心理学视角观照中国艺术,也以中国为镜反观西方文化,弥补西方经验的不足,以建立具有普适性的科学美学理论,其“中国问题”路径对中国当下美学和艺术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当代中国文论进入“新时代”,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也正在做出相应的学术战略的调整。如果说此前更多是被动式、引进式开放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尤其是当代中国文论学者在逐步熟悉和消化了西学新潮之后,正在学会甄别与遴选,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文论建设的主体意识。因此,新时代当代中国文论的关键词有“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和“当代中国文论海外传播”等。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主动式、输出式开放作出一点儿贡献。

曾 军

2019年1月